

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傳統金匠脈絡研究

陳怡君* 邱上嘉**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生，通訊作者
E-mail: babystylist_755@hotmail.com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教授
E-mail: chiousec@yuntech.edu.tw

收稿日期：2015.11.11；接受刊登：2016.07.25

airiti
摘要

臺南市金工產業自清領時期已經蓬勃發展，當時金銀買賣大多匯聚於現今臺南市中區。本研究以日治初期第一次人口普查明治38年至大正3年（1905年10月-1914年）間的戶口調查簿資料為基礎，並輔以歷史研究方法探討日治初期臺南廳最繁榮商埠區域「十字大街」（現臺南市中區）的金工榮景、金匠人口脈絡、從業聚落、金匠關係、及師承系譜等相關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分析當時繁榮商埠、經濟、人民習慣與移民人口對金工產業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一、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從業的金匠以臺灣人最多，占當時從業金匠總人口數的93.7%。其中又以現居臺南市的金匠的比例最高，占金匠總數的85%；日本與中國金匠僅占總數的6.3%。二、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已經形成多處金匠聚落。其中以「十字大街」附近的竹仔街區域金匠聚集比例最高，其次為元會境與三界壇區域。三、臺灣籍金匠之間的關係大多為直、旁系親屬、同居寄留或雇傭關係；臺灣籍與中國籍金匠由於職業因素在當時產生「共生寄留」的族群融合關係。金匠間的師承系譜明顯採取師徒、親屬、宗族傳承技藝的方式。貴金屬工藝之所以能歷經百年延續，除了臺灣先人的生活習慣之外，當時的商埠、經濟發展、人民奢華氣息，是造就金工產業在臺南百年基石的重要動力。

關鍵詞：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臺南市中區、傳統金匠

airiti

壹、前言

貴金屬具備奢侈、財富、權力、美麗和不朽的象徵，金工藝術雕琢之美，使人類對其魅力難以抗拒。臺南是全臺金銀珠寶代工的大本營，早在清領時期臺南傳統金匠已經奠定堅實的基礎，也因此在金工業界間贏得「臺南金仔窟」的盛名（周宗楊等 2014），區域產業的發展除了人口聚集因素之外，人口特質及人口脈絡具有關鍵性的因素。17-19世紀間，臺南一直維持臺灣第一大城的地位，清領時期（1865年）開放安平港，對外貿易帶動清末臺南市的經濟成長，社會結構也因此有了顯著的變動，臺南治安較鄉區佳、經濟繁榮、商行林立、富人豪紳多，因而造就了臺南商務鼎盛。《荀子·富國篇》曰：「人生而有欲」，對於富貴及美好事物的追求，乃是人性人情合理的欲求，「富貴者，乃具既富且貴之氣也」。當時的富人喜以身穿絲綢、搭配金飾、玉簪等金銀飾品彰顯富貴，一般百姓平時也以銀飾、銀珠妝扮自己（曹婷婷 2014），加上臺灣先民的生活用品，喜以「金銀」為主要材料，打造成各式銀器、飾品及貼身物品等（林明德 2002），因而造就金工產業在臺南的發展。負責打造「金細工藝」的金匠乃為珍貴金工藝品的靈魂人物，其蘊含的匠藝在傳統文化資產概念中乃屬「非物質文化資產」。然，老一輩的金匠逐漸逝去，導致傳統技術面臨失傳，師承傳習制度如今也轉變為校園體制的授藝方式，綜觀國內金工相關研究，對臺灣傳統金匠人口脈絡、師承系譜等相關調查研究仍鮮少為人著墨。

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期，在臺灣打造第一條商務大街「普羅民遮市街」，也就是清領時的「府城十字大街」（現今臺南市中區）。十字大街區域販售生活物品應有盡有，百業爭鳴，是全臺最早發展商業聚集的地區。清領時期由於產業的特色順應發展出街道與聚落，當時臺南市有一部分的街道命名會以產業特色命名（曹婷婷 2014）。光緒

一年（1875年）臺灣府城街道全圖中，十字大街北段出現「打銀街」這一條街道名稱，從街道命名證實，清領末期金屬工藝已經在臺南市奠定根基，因而形成商業街道。打銀街的誕生無疑見證清領時期，臺南金工產業與金匠的榮景。

日本人統治臺灣時（西元1895-1945年）針對全臺共進行七次人口普查（中央研究院 2015），本研究以最接近清領時期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明治38年至大正3年（1905年10月-1914年）9年間的戶口調查簿資料為基礎。以臺南市商業蓬勃發展的「十字大街」區域（現今臺南市區）為主要研究範圍，針對戶口調查簿內「金銀細工」職的從業人口進行調查研究。期望以具科學性證據探討日治初期臺南市傳統金匠人口脈絡、從業聚落、金匠關係及師承系譜。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打金仔師傅」在臺灣傳統產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他們也代表著社會的經濟櫥窗，金工產業的發展無疑見證臺灣庶民的生活品味與富貴氣息。臺南傳統金匠以熟練的拉絲、澆鑄、雕花、鑿刻、斬花等純手工技法，將金銀打造成完美藝品，然，由於脫蠟鑄造的技術引進及現代化機械推陳出新，傳統技藝正面臨失傳之虞，機械打造的金飾已經逐漸替代老師傅的純手工技術。除了傳統金飾造形不再、傳統技法流失，更可惜的是，隨著老金匠相繼辭世，傳統金匠脈絡也逐漸被遺忘。過去國內諸多學者投注在「金工」、「金屬工藝」等相關議題的研究，其研究範疇主要集中於：金工技藝、造形、藝史與媒材研究等；有關金匠人口的研究，也僅以少數個人匠師的作品與經歷進行探討研究。過去對於臺灣金匠脈絡，僅能透過老金匠的口述或是臺南百工技藝、歷史、經濟等文獻中被提及，其所建構的金匠人口脈絡零散且缺乏組織，對於日治初期的金匠人口脈絡難以有系統性的再現。然而，自清領時期金屬工藝在臺南市早已奠定發展根基。「金工」產業是先民重要的百工技藝之一，也影響往後臺南市金工技藝近百年的發展。

從清領到日治初期，臺南市傳統金匠以鑿花鏤空、拔絲纜絲等細膩的花絲工藝將金細工藝推至絢爛極致。「為追求文化多樣性，持續尊重人類的創造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傳統手工藝也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其中之一（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2）。臺南金匠當時聚集在商埠最繁榮的「府城十字大街」（現今臺南市中區）所創造的金工榮景、金匠人口脈絡、從業聚落及師承系譜一直缺乏深入探究與得到科學性的證實，因此，臺南金匠人口脈絡的深入調查成為本研究最初之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即利用日治時期臺南市中區的「戶口調查簿」資料為基礎資料，針對日治初期，在臺南市中區執業的「金匠」人口脈絡與從業區域群聚現象進行深入探究；並輔以歷史研究法，追溯清末至日治初期「金匠」的發展與師承關係。

二、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以清領到日治初期百工聚集的「十字大街」區域（現臺南市中區）為研究範圍。根據清領時期十字大街與現今臺南市中區對照圖（見圖1），十字大街位於現今臺南市中區民權路二段與忠義路二段交叉口。由於清領時期僅以田賦清查方式，並未對全臺人口有明確的掌握，直到日治時期，日人為掌握全臺人口動向而進行全臺戶口調查。本研究即以日人在臺南市中區第一次普查（1905-1914年間）戶口調查簿資料為研究範圍。針對「職業欄」中登錄為金工相關從業者為主要調查對象，包含：金銀細工、銀細工、金銀細工行商（雇人、職人）等職稱，並將戶口簿上所載明的「現住所、原籍、種族、姓氏、職業、生日、父母、事由」欄位進行數位建檔，透過資料訊息進行歸類與研究分析。

為避免閱讀本文產生混淆，本文中將上列「金銀細工」相關從業人員一律以「金匠」一詞稱謂、戶口（籍）調查也一律以「戶口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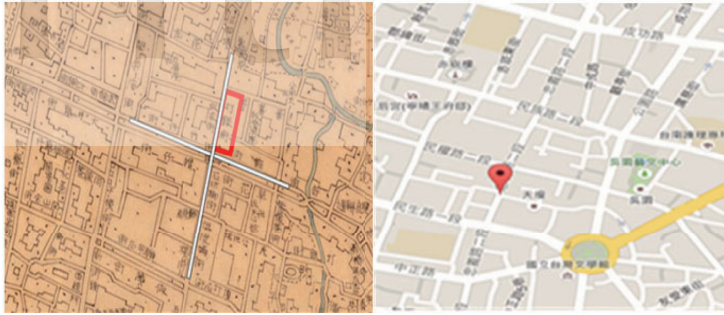


圖1 清領時期臺南十字大街與現今臺南市中區對照圖

資料來源：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08）；Google網路地圖（n.d.）。

查」一詞稱謂。由於日治時期的戶口普查，是由各管轄區域的警察人員進行，因此本研究對於臺灣金工產業人口歷史脈絡研究，具有法律憑據及科學性的參考價值。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傳統金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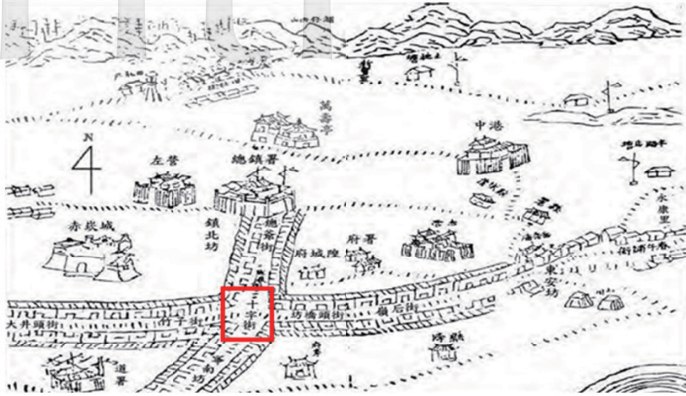
《漢典》對於「匠」的解釋為：具有某一方面熟練技能，有手藝之人。「金（銀）匠」即是以金（銀）為材料，使用工具搭配熟練技能，以手工打造成金銀器、飾品及其他製品的手藝人。《安平縣雜記》工業篇記錄臺灣早年重要的工藝史料，並載明執藝傳授者的脈絡：「臺灣貨物多自外來，執藝事者亦來自福、興、漳、泉，而傳授焉」。工業篇裡紀錄了當時百項工業，其中一項即是「銀店司阜：一切婦人首飾釵釧、環鐲及什用銀器，均資製造」（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金匠在臺灣先民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清領時期「銀店司阜」以精湛技法打製各式金銀器具，臺灣先民生活中除了婦人首飾釵釧以金銀打造，甚至連日常生活用品、民間禮俗及神明祭典、宗教祈神活動所需的神佛帽冠等藝品，都會請銀店司阜特別打造。

臺灣傳統金匠早年承襲來自閩粵師傅的傳授，常以柳絲、鑿花、敲花等傳統手工技法打造金屬藝品。日治時期，臺南市銀店司阜的技術與金工發展已富盛名，當時臺南市數十位手藝精湛的師傅，依照各自專長，共同打造一座純銀的赤崁樓贈送給日本皇太子，純銀的赤崁樓做工精緻，樓閣中每扇小窗子均可開關，足見當時臺南市金匠卓越的技藝與巧思（周宗楊等 2014）；之後臺南金匠逐漸發展出地方特色，金匠以臺灣風情為設計題材，打造純銀水牛、牧童、檳榔樹等鄉土風味的金銀擺飾放置商店櫥窗展示。法國藝術史家泰恩（H. Taine 1828-1893）認為，藝術品是因應社會需求而誕生，也是見證當時社會、文化的鏡鑑（曾培、葉劉天增譯 1992）。工匠是藝術品的靈魂人物，他們將感受到的社會脈動，以藝術、技巧、創作傳達於作品中。

二、府城十字大街

「臺南」是臺灣的第一座城市，建城歷史可上推至荷蘭統治時期（1624年），之後歷經明鄭、清領、日治時期，期間經歷不同文化的融合交流、移民族群等因素，因而使臺南市型塑成一座人文、歷史文化背景特殊的城市（鄭維中譯 2007）。從荷蘭到清領時期，臺南市一直是全臺政經樞紐。明鄭時期（1661年）以赤崁為「承天府」，仿照中國內地制度劃分為東安、寧南、鎮北、西定四坊，街界四坊狀如十字（現今臺南市民權路二段與忠義路二段交會），當時漢人稱十字大街為「赤崁街」（王振惠 1978）。直到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行政區改制，因「臺灣府」地理位置在臺灣全島之南故稱「臺南府」，就此臺南有「府城」的封號，十字大街亦稱為「府城十字街」（見圖2）。

清領時期開放海禁，三郊鼎立、外國來臺締結商業條約，促使中國各省及遠洋商泊貿易絡繹，十字大街的工商愈形發展，《臺灣縣誌》云：「開闢以來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市街紛錯」。當時重要商物如：鍛冶、米穀輸出、銀細工業等，需經官方特許方可經營（黃



經緯座標：22.994861, 120.203478

圖2 康熙末年府城十字街圖

資料來源：陳文達（1961）。

典權 1958b)；日治期間開鑿運河，古郡舊府漸具現代化。到了日治初期，「十字大街」仍是商務聚集的重要區域。直到日人正劃市區後，工商重鎮才日漸擴展到外圍新興街區。從荷蘭到日治時期「府城十字街」一直是臺南重要的商業區域，也造就臺南市幾世紀的繁華榮景。

三、臺南庶民生活對金工產業的影響

「金銀細工」意指：以金、銀為製成材料，利用金、銀遇熱後所展現的高度延展性，拉金為絲、澆鑄、焊接或鑿刻、鏤空等，以層層盤繞堆疊、連結成形的細膩工藝技術。東方考古紀錄顯示，中國早在商朝（西元前1768-前1122年）就開始使用黃金；到了戰國時期鑲金技術已發展成熟；唐朝時由於東西方文化交流及金銀器普遍盛行的影響，使金銀細絲技術及各種寶石鑲嵌工藝更顯成熟（戈思明 2015）。

西元1644年（荷蘭統治時期），統計從中國移民至臺南的人口約有十萬人，當時移入臺灣主要居住分布以臺南及高雄為限。最早移民至臺灣的中國移民者以福建省（閩）的漳州、泉州及廣東省（粵）的

嘉應州、惠州的移民人數最多；西元1662年，明鄭據臺後，漳、泉二府渡臺人數更多，他們即以臺南為主要居住中心（陳漢光 1972）。直到清領臺灣後，頒布「渡臺禁令」，對於中國人民渡臺有嚴格限制（李明珠 2006），自此臺灣的人口結構趨於穩定。從荷蘭、明鄭時期來臺的先民，歷經清領到日治時期三百多年的族群融合，這群閩粵移民者早已成為臺灣「本籍」的一份子。來自中國移民的先人，將原有漢人的生活習慣、服飾、文化、技藝一併帶入臺灣。從先民所遺留的金銀器具、珠寶製作工法與物件上所標注銀樓店號得知，早期臺灣的金銀器，並非全部由臺灣在地生產打造，有一部分是來自中國沿海地區（周宗楊等 2014），隨著臺灣人民生活習慣、商業經濟的發展，來自中國移民的金匠將卓越的打金技術帶入臺南，提供庶民日常生活所需。

1865年安平港開放通商，成為中國與西方貿易的重要一環。1860-1895年為止，臺南洋行、商行林立，開港後造就臺南市經濟與商務鼎盛，也讓清末臺南嘗試最先進的現代化。當時府城十字大街繁華之景堪稱全臺之冠，十字大街主要販賣女性用品及高檔精品，鞋街、帽仔街、打銀街、草花街、竹仔街等是零售商店及百工技藝匯集處（曹婷婷 2014），舉凡女人家生活所需的布料、金飾、裁縫、肚兜、花草一應俱全。由於商業街道緊鄰，因此十字大街上常見女性上街採買的身影，從許多臺南文獻可得知當時女性裝扮與生活景象。

富盛女性裝扮講究，尤其，早期自泉州移民來臺的富商家，當時興婦人小腳才美的審美觀，因此，富貴人家婦人仍恪守纏小腳，這些「三寸金蓮」的女人每每出門，總是手持一把遮陽傘紙傘，掩住面容以不讓人瞧出，加上纏腳之故，走起路來搖曳身影，煞是好看，也成為十字街常見的風情。（翁佳音等 2011）

清代臺南市為全臺經濟發展之首，來自泉州移民的女人愛漂亮，對裝扮講究，再加上府城富人多，喜身穿絲綢搭配金飾、玉簪等貴氣飾品，臺南市由於經濟繁榮及庶民生活對金銀細品的需求，因而帶動金工產業的興盛。清朝《諸羅縣志》記載當時女性妝扮：「婦女過從，無肩輿，則以傘蒙其首；衣服必麗，簪珥必飾，貧家亦然」（周鍾瑄 2005）。顯見，當時移民者遷臺後，女性亦隨中國內地之生活習俗，無論貧富都會穿戴髮簪、銀飾妝點自己。庶民生活中不止女性佩戴金銀打造的簪珥、胸佩、戒指、手環、帽花等飾品，甚至富貴人家家居裝飾如：蚊帳勾、髮梳、刮舌苔棒；食具如：筷子、湯匙、碗盤等都以金銀打造。《天工開物》指出：「凡色至於金，為人間華美貴重，故人工成箔而後施之」（蔡仁堅、蔡果荃 2012）顯現人們期望藉以金銀貴金屬物品彰顯其尊貴與價值。

孔子《論語·里仁篇》明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怨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荀子·富國篇》曰：「人生而有欲」。對於富貴及美好事物的追求乃是人性人情合理欲求，當時臺南市由於富人多，加上人民生活水準普遍較高，無論男女在生活與物質上對個人品味的要求亦顯貴氣，所謂：「富貴者·乃具既富且貴之氣也」。

到日治時期，日人頒「產金法」強制徵收黃金，並禁止民間黃金自由買賣，由於查緝嚴格，日治時期黃金首飾物品並不常見，打金師傅改為打銀才得以繼續經營金工產業（周宗楊等 2014）。《臺灣通史》也對當時臺南卓越的金工技術及女性裝扮有所描繪記載。

又臺灣產金，故婦女首飾多用金。一簪一珥，極其精巧。而臺南所製銀花，質輕而白，若牡丹、若薔薇、若荷花、若菊，莫不美麗……（連橫 1921）

金銀細物在移民入臺初期，主要做為保值應變之用，然，由於

當時臺南市人民富庶、經濟繁榮，奢侈金品因而成為庶民展示個人能力與財富的媒介，藉以象徵社會階級和加強自我形象。人本心理學之父馬斯洛認為：「人是一種不斷滿足需求的動物」。人類按照需求的強弱分為五個階層：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馬良誠 2010）。當經濟能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後，進而會向更高層次的需求躍進，以達到受肯定尊重及自我內心實現的最高層次。人們藉由財富購買奢侈品，使內心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期望藉由奢侈品的獨特性提升個人地位，並得到外界的尊重，以達到內在的優越性。

17-19世紀的臺南市，政商、洋人聚集，買辦、豪紳崛起，社會結構因而產生顯著的變動現象，富人喜以穿戴金銀細物奢侈品彰顯地位並展現富貴氣息。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奢侈性的消費反映著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循環規律，消費者重視的是商品所賦予的社會與經濟價值，透過商品所傳達的獨特性彰顯個人的地位象徵及優越性，滿足內在心理需求（Amaldoss and Jain 2005）。

四、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與戶籍登記演進

日人領臺之初，即開始注意臺灣住民戶口調查，明治29年（西元1896年）8月，制定臺灣住民戶口調查規程，最初數年日人在臺頒布戶籍法之始，因各地秩序未定，有關人口之查記並不完整，登載內容也僅記載戶主及家屬之姓名、年齡、稱謂等項，戶口調查也不分本籍或寄籍。直至明治32年（西元1899年）才有臺灣住民人口統計資料出現。戶口申報採現主義，凡同居同炊者，無論是否親族，均視為一戶，並增加各戶現住者調查項目如：身分、職業及異動情形，並視察其性及生計狀況。但是，當時有關人口之查記仍然未臻準確完整（洪慶麟 1967）。

明治38年（西元1905年）日人在臺灣環境較安定，並修正前二次戶口調查之缺失。於1905年10月施行全島第一次大規模戶口調查，

稱之為「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日本統治時期共計進行七次人口普查（洪汝茂 2005）。戶口調查由知事或廳長命首席警部或警部補，負責戶口調查管理監督及編製辦理；由郡守、警察署長、警察分署長或支廳長掌理之。當時臺灣住民的身分證明並無別種證明簿，完全以戶口調查簿為根據，因此戶口調查簿本也是警察勤務參考帳簿。從戶籍資料的訊息中，警察機關可藉以瞭解戶口異動、居民之素行、經歷、職業、健康狀態、原籍及其人際身分關係等。戶口登記規則採「現住主義」與「本籍主義」兼顧，意指，以臺灣住民之住所為其「本居」，本居地的本人、其家屬、及非家屬但同居者於本居者，全部均予記載，以戶為單位編製。戶口實查時間依據人民素行而分為定期實查、異動實查與臨時實查三種。定期實查為每半年進行實查一次以上，針對具有地位名望及素行良好之人；異動實查與臨時實查，為每三個月實查一次以上，針對一般百姓及犯刑事嫌疑者、流氓等（洪慶麟 1967），日治時期臺灣戶口調查簿內容記載完備，殆為當時日本內地所不及。

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共分為：「本籍」、「寄留」及「除戶」戶口調查簿三種。「本籍戶口調查簿」以戶主為本，依《戶口規則》第五條規定：「本島人（臺灣人）在市街庄區之地域內設定『本籍者』，以戶主為本，每一戶編製之。」另，番地之原住民、在日本已設本籍者，不得編製本籍戶口調查簿。「寄留戶口調查簿」以世帶主（戶長）為本，無論是本籍、本籍不明或無日本國籍者，凡在本籍外特定場所、住所或居所滯留達九十日以上者，視為寄留者。依《戶口規則》之規定：「寄留戶口調查簿以世帶主（戶長）為本，按每一世帶編製之，亦依地番號裝訂之」。如因轉寄留、分家或因入籍他家而自戶口調查簿中除去者，則編訂為除戶簿內（中央研究院 2015），因此，日治時期的人口脈絡可藉由戶口調查簿得到準確的資訊。

當時戶口調查簿所使用的填表格式，每一位戶員所需詳述記載的個人欄位共17欄，並分為為本籍與寄留（遷徙人口）格式，本籍戶口

調查簿採黑色印刷，寄留簿則以紅色印刷予以區分，寄留戶口與本籍戶口格式相同，僅在左上角多標注「戶別欄」，本籍與寄留二種格式分為甲號（見圖3）及乙號二種（洪汝茂 2005）。

從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的資料顯示，臺南從事金工行業的從業人員主要分為「金物買賣商」與「金物打造者」二類，這二類又細分為雇主與被庸人（雇人）。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中，屬於金工職業的職業登錄名稱包含：銀細工、銀細工業、打銀職（雇）、銀細工販賣（店雇）、銀細工物商行、金銀細工、金銀細工業（職人、雇人）、金銀細工行商（雇人）等。本研究根據戶口調查簿內金匠登載的「現住所」、「本居又ハ本國住所」、「事由」、「種族」、「前戶主トノ續柄榮稱職業」等為重要調查依據。

編碼	登載名稱
1	現住所
2	本居又ハ本國住所
3	族稱
4	戶主トナリタル年月日事由
5	事由
6	種族
7	阿片吸食
8	纏足
9	種別
10	不具
11	種痘
12	續柄
13	父母
14	出生別
15	前戶主トノ續柄榮稱職業
16	姓名
17	出生年月日

山	事	山	事	所	住	現
						5
						1
足	纏	不	具	種	別	種
						8
						7
						6
						3
						2
族	稱	種	族	種	別	種
						11
						10
						9
前	戶	主	ト	ノ	續	柄
						12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17
						15
						13
						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4

圖3 本籍戶口調查簿甲號說明

資料來源：洪汝茂（2005）。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戶口調查簿資料為基礎，針對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

匠」人口進行研究調查。以現存於臺南市中區明治38年至大正3年（1905年10月-1914年）九年間，日人進行第一次全面調查的戶口調查簿資料（共97冊）為分析內容。戶口調查簿包含本籍簿、寄留簿、除戶簿三種格式，每一冊平均約250頁，一頁二面共記載戶主、親屬、寄留成員等約5-6人的戶口訊息，本研究共計清查日治時期戶口資料約十萬人。

首先以戶口調查簿中「前戶主卜ノ續柄榮稱職業」欄位中，登載職業欄屬於金工相關職業者為主要研究目標，並將戶員在調查簿上所登載的「現住所、原籍、種族、姓氏、職業、生日、父母、事由」資料建檔後，以敘述性統計進行相關數據分析，經由「種族」欄位瞭解從業者原籍脈絡，最後藉由「現住所、事由」欄位等遷移紀錄進行分析。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的特定地域進行「金匠」人口脈絡研究。除追溯臺南市中區原始「金匠」的脈絡根源，探究「金匠」執業聚落、族群融合後彼此間的影響及師承脈絡。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探討臺南市中區金匠人口脈絡及當時繁榮商埠、經濟、人民習慣與移民人口對金工產業的影響，也可做為未來進行「金匠」人口全面性研究的基礎。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戶籍職業為「金銀細工」相關職業稱別的戶口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臺南「金匠」人口、原籍脈絡、群聚區域等相關研究，藉以瞭解臺南市中區傳統「金匠」人口脈絡與師承關係，進而探討日治初期，府城十字大街區域的經濟發展對傳統「金匠」從業聚落的影響。

一、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匠從業人口分析

金銀細工行業的興盛與金匠人數及消費人口息息相關。根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統計日治時代初期（1901-1909年）全臺23座城

市中，有登錄為店鋪者共計6,509家，登錄為「銀店」的數量共197家，占當時全臺店鋪的3%。其中又以臺南24家銀店為全臺之冠，其次為大稻埕20家、鹿港15家。從日治初期的銀店數量顯示得知，清末至日治初期臺南為臺灣打銀匠的主要集中地（陳金田譯 1993）。儘管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即對全臺進行打銀店鋪的調查，但是日治初期並沒有針對全臺各戶口內的從業人員進行全面統計。由於金銀細工屬於專業性的技術，專技人員不一定有開立店鋪，再加上從業人員工作地點異動、住所異動或更改職業等因素，在當時並不容易準確掌握各地區金匠人數。因此，本研究首先針對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匠」人口進行分析統計。

明治38年至大正3年（1905年10月-1914年）間，現存於臺南市中區的戶口調查簿共計97冊，而戶籍冊內有登錄與金工行業相關之從業人員共94冊。調查之時發現，臺南市中區戶政事務所於明治38年至大正3年（1905年10月-1914年）間的戶口調查簿並未依照本籍與寄留戶分別列冊，而是以年分及負責管轄的地域派出所分冊，因此同一冊的戶口調查簿中常出現本籍戶口（黑色印刷）與寄留戶口（紅色印刷）列於同冊之中，而當時負責臺南市中區戶口調查的派出所包括：竹子街派出所、三界壇派出所、莊雅橋派出所、元會境派出所。從臺南市中區現存日治初期的戶口資料簿顯示，關於日治初期金匠從業人口統計資料如表1。

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匠」人口的密集程度也可從各戶口調查簿中顯見。現存的97冊戶口調查簿中，共94冊戶口調查簿（扣除編號0444、0458、0459三冊戶口調查簿）內有關於「金匠」的戶口登錄資料，由上述資料得知，當時「金匠」人口遍布於臺南市中區。未刪除重覆登錄為「金銀細工」人口的戶員共419人，扣除因遷移或同一地區重複普查登錄的人口，實際從事金工相關產業的本籍與寄留戶人口共300人（不包括雖與金匠同戶口只單純登記同居寄留、雇人身份，但其職業欄沒標明為金銀細工從業者之戶員）。

表1 日治初期金匠從業人口統計資料

戶口資料簿 調查年度	戶口調查簿 資料編碼	共計 (冊)	金工從業人數 (人)	刪除重複調查 所剩金工人數 (人)
明治39年 (西元1906年)	0366-0377	12	65	55
明治40年 (西元1907年)	0378-0392	15	77	49
明治41年 (西元1908年)	0393-0403	11	59	40
明治42年 (西元1909年)	0404-0414	11	52	37
明治43年 (西元1910年)	0415-0427	13	38	27
明治44年 (西元1911年)	0428-0437	10	26	17
大正1年 (西元1912年)	0438-0443	6	34	26
大正2年 (西元1913年)	0445-0453	9	41	32
大正3年 (西元1914年)	0454-0462	7	27	17
合計		94	419	3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金匠群聚區域分布與原籍分析

(一) 金匠群聚區域分布

明治30年(1895年)臺南市的街道共185條，這些街道主要都分布在中區(楊南郡譯 1996)，當時中區各派出所分別負責管轄的區域劃分如圖4。日治初期商店及百工技藝仍然集中在十字大街附近的舊街道，而十字大街附近的戶口調查工作則是由竹仔街派出所負責。

現存於臺南市中區(明治39年至大正3年間)的戶口調查簿，是依照當時行政劃分區所負責管轄的派出所分類，根據日治初期300位金匠在各管轄派出所登錄從業人口分布(見圖5)：竹仔街派出所98

人、三界壇派出所66人、莊雅橋派出所47人、元會境派出所89人。其中以竹仔街、三界壇與元會境派出所管轄區域的金工從業人數最多。

根據研究資料證實，當時十字大街的商務繁榮吸引「金匠」人口聚集，日治初期即有大批傳統「金匠」在此交集與發展。根據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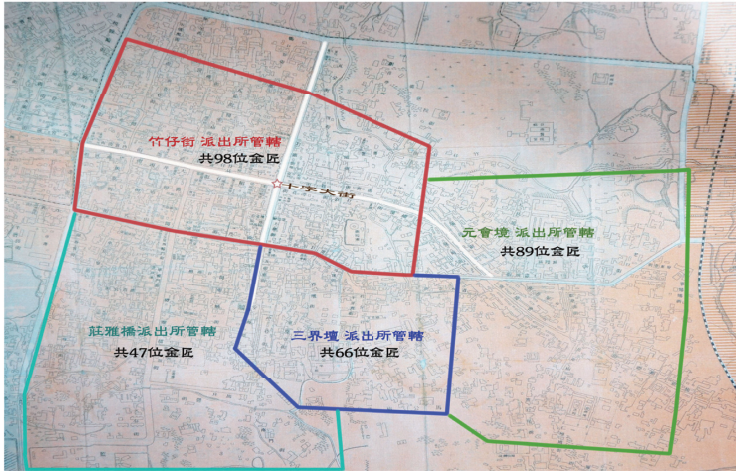


圖4 中區派出所負責管轄的區域劃分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臺南市中區金工從業人員的從業區域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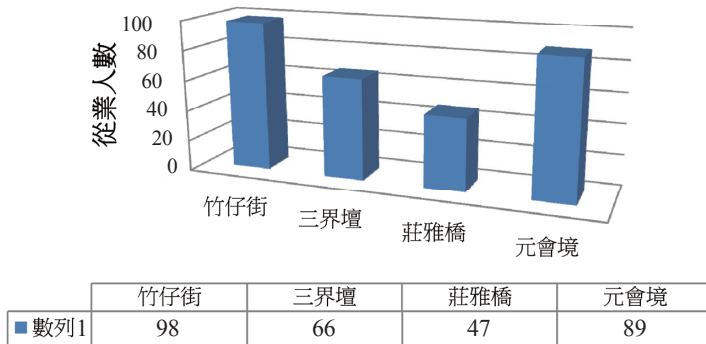


圖5 日治初期金匠從業區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結果，最值得討論的為「元會境」區域，主要是因為在過往的文獻及口述訪談中，大多僅記載竹仔街區域「金匠」的群聚現象，對其他區域所形成的「金匠」聚落缺乏具科學性探查與明確的歷史紀錄。本研究透過戶口調查簿研究證實，日治初期臺南市除了竹仔街區域是「金匠」聚落的重要區域之外，元會境區域也是當時「金匠」的大本營。

（二）金匠原籍分析

西元1644年（明崇禎17年）統計從中國移民至臺灣約有十萬人，到了西元1662年（清康熙元年）第二次大移民，中國移民者以臺南為主要居住中心的人更多（陳漢光 1972）。中國與臺灣經過近三百多年的族群融合，到了日治時期時臺灣本島居住人口幾乎以漢族為主。日治初期，日本政府為響應「獎勵私營移民政策」回日本本地招募日人移民至臺灣，當時日本人統稱臺灣人為「本島人」。戶口調查簿「種族」欄位上凡標著「福」即俗稱臺灣人，「廣」意指臺灣的客家人，「熟」、「平」、「生」、「高」意指臺灣的原住民，「內」為日本人，「清」、「支」、「中」表示是中國人（洪汝茂 2005）。

移民族群進入臺灣後「金匠」產生人口融合的現象，為釐清日治初期臺南中區的金匠原籍脈絡，本研究針對300位「金匠」的種族人口比例分布進行分析（見圖6）。研究結果顯示：300位金匠「種族」欄位登記「福」籍的臺灣人共281人、「內」籍（日本人）共6人、「清」籍（中國人）共13人。從研究結果得知，當時臺灣金匠的種族欄位全部皆為「福籍」。臺灣「金匠」與來自日本及中國移民的「金匠」人口相差甚鉅，來自日本與中國「金匠」總人口數僅占當時「金匠」人口總數的6.3%。顯見，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匠」以福籍的臺灣人居多。

根據臺南市中區300位「金匠」在各區域的原籍分布顯示（見圖7），福籍的臺灣人從業區域主要分布於竹仔街及元會境這二個區域；來自日本的移民主要位於竹仔街與三界壇，從業人數各3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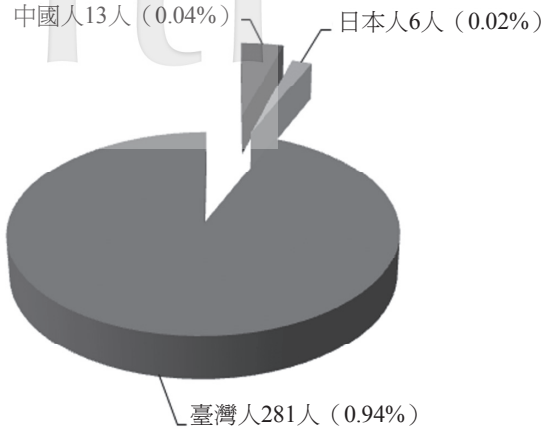


圖6 金匠種族人口比例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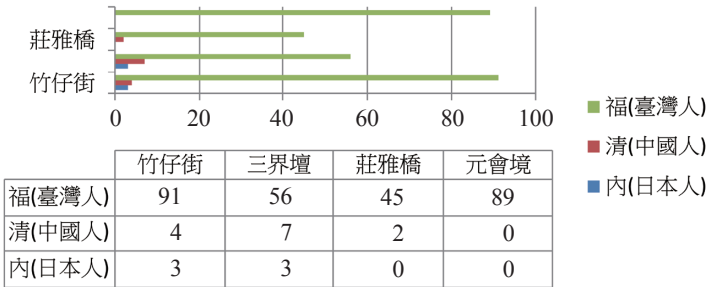


圖7 300位金匠在各區域的原籍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自中國的移民主要分布於竹仔街（4人）、三界壇（7人）與莊雅橋區域（2人）。這四個區域就屬元會境區最特別，根據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元會境區域的「金匠」全數為福籍（臺灣人）。元會境區域的地裡位置並不是位於熱鬧的十字大街上，當時該區主要的居住人口以臺灣人的比例最高（黃偉嘉 2015），這可能也是形成全區均為福籍金匠的主因。

由於具備專業性質的產業要形成龐大從業人口，需要經歷幾十年

的時間方可促成，因此從日治初期「金匠」在各區域的人口分配資料推論，早在清領時期，臺南「金匠」在臺南中區早已形成堅實的產業聚落，清領時期應該已經有為數不少的「金匠」在此執業。

三、金匠人口脈絡與傳承系譜

臺灣先人為求生活安穩欲學習一技之長者，都得到專業師傅家中（或其工作場合）擔任學徒，學習時間為三年四個月，故當時「三年四個月」就成為學徒的代名詞。早期拜師學藝的行業如：理髮師、裁縫、金工、木工、做餅等行業，由學習時間冗長，工匠或學徒則多半以寄留或共居方式跟隨在師傅身邊，再加上日治初期的戶口普查規定：「無論是本籍、本籍不明或無日本國籍者，凡在本籍外特定場所、住所或居所滯留達九十日以上者，視為寄留者」（洪汝茂 2005）。因此，在戶籍登記簿裡即出現工匠同居現象，他們大多以「同居寄留人」、「同居人」或「雇人」等身分關係登錄在戶長的戶籍內。以下分別針對中國、日本及臺灣的「金匠」從業人員之「原籍／同居寄留關係」進行分析討論。

（一）中國籍金匠人口脈絡與傳承系譜

十字大街因商業及工藝的發達而吸引「金匠」的聚集，根據 1906-1914 年間第一次戶口調查資料簿顯示，來自中國的「金匠」共 13 人。13 位來自中國的「金匠」所填寫的戶口簿均為寄留戶本（見圖 8），並且有好幾位「金匠」在戶口調查簿中明確載明他們與寄留戶主之間的關係。根據中國籍金匠原籍／本居分布顯示（見圖 9）：13 位中國「金匠」全部來自福建省，其原鄉地主要集中來自於福州府 7 人、泉州府 5 人、漳州府 1 人。

根據 13 位中國「金匠」的事由欄、寄留遷移紀錄及寄留戶主的資料顯示：13 位「金匠」全部寄留於福籍（臺灣人）的戶籍內，其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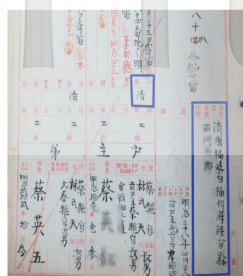


圖8 中國籍金匠寄留戶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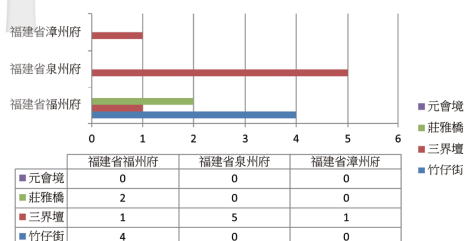


圖9 中國籍金匠原籍／本居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確登載為受雇人者共8位、2位登載為同居寄留人、另外3位則僅知其為寄留身分，但無法確認他們與戶主間的身分關係（表2）。

在幾位臺灣籍「金匠」戶口調查簿中發現，他們會同時聘任多位來自中國與臺灣的金匠，使得中國籍「金匠」在臺灣籍「金匠」的工作場域形成族群融合的現象。中國籍「金工」的寄留身分大多是登錄

表2 中國籍金匠在臺同居寄留關係

管轄派出所	姓名	原籍	同居寄留關係
竹仔街	蔡英鈺	福建省福州府	萬泉（福籍）雇人
	游立立	福建省福州府	萬泉（福籍）雇人
	林利土	福建省福州府	邱滌卿（福籍）雇人
	曹詠司	福建省福州府	陳牛（福籍）雇人
三界壇	洪清波	福建省泉州府	陳牛（福籍）雇人
	董榮宗	福建省泉州府	陳牛（福籍）雇人
	劉丹	福建省泉州府	陳坤（福籍）雇人
	王陞潮	福建省福州府	林賜銓（福籍）同居寄留
	施中立	福建省泉州府	寄留
	連水茂	福建省漳州府	郭回（福籍）同居寄留
	曾文生	福建省泉州府	寄留
莊雅橋	朱增藩	福建省福州府	寄留
	方壽年	福建省福州府	歐仕（福籍）雇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為「雇人」，少數為「同居寄留人」身分。由此可知，來自中國的師傅來臺前已具備金工打造的技術。從遷移寄留資料中發現，中國來臺的「金匠」並非短期居住在臺灣，他們來臺與臺灣籍師傅一起從事金工技藝，在金工打造技巧與創作風格是否會相互影響，此一問題將有待後續研究者深入探討研究。

（二）日籍金匠人口脈絡與傳承系譜

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300位「金匠」中，僅有6位來自日本移民。日治時期來自日本的移民者大多居住在十字大街附近，根據6位「金匠」戶口資料顯示，他們主要居留地區位於竹仔街與三界壇。日治時期戶籍登記規定，凡在日本已設本籍者之日人，不得編製「本籍」戶口調查簿，因此6位來自日本的「金匠」所填寫的戶口簿均為寄留戶本（見圖10），其原籍／本居地區分別來自鹿兒島縣3人、兵庫縣2人、德島縣1人（見圖11）。根據6位日籍「金匠」的事由欄、寄留遷移紀錄資料顯示：其中5位以戶主身分登載，只有1位是雇人身分（如表3所示）。

本研究為求嚴謹起見，「金匠」人口統計不包括雖與金匠同戶口，但只單純登記同居寄留、雇人身分，其職業欄沒標明為金銀細工從業者之戶員。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治時期的「雇人」或「同居寄留」身分者，並不一定與雇主從事同一類的職業，有些雇人是雇主的家庭幫傭、奶媽、或雇主有從事第二份工作的雇傭人；而有些同居寄留人則為戶主的旁系親屬、或同居寄留者的孩子。例如：根據表3日籍「金匠」山本信一戶內所登載的雇人與同居寄留人共4位，但這4位的「職業欄」並未載明從事「金銀細工」相關行業，本研究則不多加揣測其是否為金工從業人員，因此未將其納入「金匠」人口統計中。

從遷移寄留資料中也顯示，日本來臺的「金匠」大多屬於全家移民，顯示當時日籍「金匠」移民來臺者大多以定居當地為主。從「職業欄」登載發現，他們大多為獨立工作戶，從戶籍內其他資料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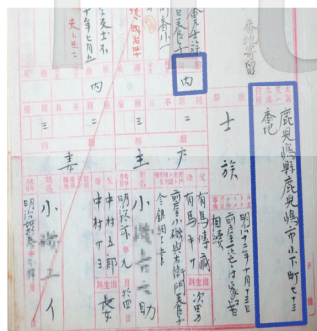


圖10 日籍金匠寄留戶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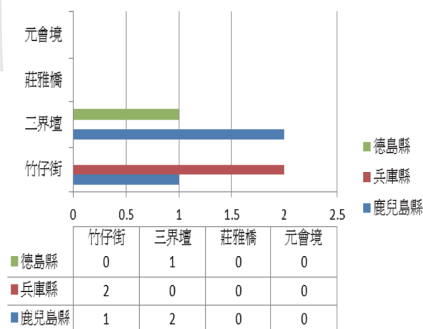


圖11 日籍金匠原籍／本居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表3 日籍金匠在臺同居寄留關係

管轄派出所	姓名	原籍	同居寄留關係
竹仔街	櫻井庄次郎	鹿兒島縣	龔允治（福籍）同居寄留
	山本信一	兵庫縣	林信（內籍）受雇人
			砂邊ツル（內籍）同居寄留
			砂邊カズエ（內籍）同居寄留
納信藏	兵庫縣	吉田ツタ（內籍）同居寄留	
三界壇	廣瀨榮熊	鹿兒島縣	
	小磯吉之助	鹿兒島縣	
	近藤市太郎	德島縣	金銀細工雇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日本「金匠」彼此之間在臺灣的宗親關係、雇傭關係、或同鄉的群聚關係等很薄弱，他們與臺灣、中國籍、甚至日本籍的「金匠」交集很低，僅有一位與臺灣籍「金匠」有同居寄留關係。從資料中發現，日籍「金匠」以近似封閉、獨立的方式在臺南市從事金工打造，由此可知，來自日本的師傅來臺前已具備金工打造的技術。證實，日治初期的日本移民者即在臺從事金銀細工行業，他們在繁榮的十字大街上與臺灣籍、中國籍師傅並存著，其金工技藝是否南轅北轍，則有待後續相關領域研究者進行深入探討。

(三) 臺灣籍金匠人口脈絡與傳承系譜

清領以前，來臺的唐山司阜將過往所習得的打金技術帶來臺灣，並發展成為臺灣在地的傳統技術。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300位「金匠」中，屬於臺灣人（福籍）共有281人，占當時「金匠」人口總數93.7%。本節針對281位臺灣籍「金匠」原籍與同居寄留關係進行深入探討，藉以釐清臺南「金匠」的原籍與師承脈絡。

根據281位臺灣人（福籍）金匠的原籍／本居地區顯示：有164位臺灣「金匠」的所原住所登錄為「現住所」，表示這164位金匠的本籍與現住所都在同一處，而另外，原籍／本居地在臺南市的有91人，根據上述顯示，將近九成（255人）以上的「金匠」屬於臺南在地師傅，占全體金匠總數的85%；其他分別來自臺北廳7人、新竹廳1人、彰化廳1人、嘉義廳3人、鹽水港廳1人、鳳山廳1人及澎湖廳11人（見圖12）。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澎湖廳的「金匠」人口，從「原籍」、「父母欄」、「續柄」及「同居寄留」等資料顯示，澎湖廳的金匠無論是原籍、在臺雇主及同居寄留等資料顯示，他們明顯呈現群聚現象，而且戶員結構中有部分為父子、兄弟、同姓及同鄉等宗族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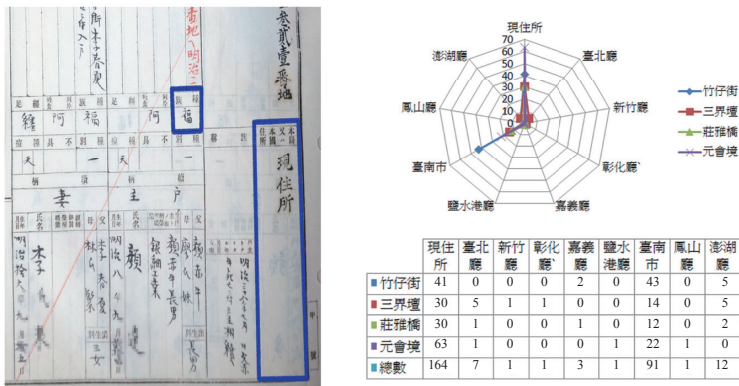


圖12 福籍金匠原籍／本居分布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藉由「事由」欄的寄留時間可推斷，來自澎湖廳的「金匠」遷移的路線大多相仿，先行者選擇當時全臺治安及經濟較穩定的臺南移居，等到在臺南有適當的工作或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時，即會邀請同宗（鄉）人前來支援，因此形成同宗（鄉）的「金匠」團體組織。11位金匠中，其中有一對是父子關係、一對是兄弟關係、甚至有姻親（連襟）關係，澎湖籍「金匠」彼此之間也有非常密集的同居寄留關係。

根據281位臺灣「金匠」的事由欄、寄留遷移紀錄、及寄留戶主的戶籍資料顯示，臺灣「金匠」產生非常密集的群聚現象。將近一半以上的人在戶口登載中載明彼此的關係，他們透過親屬關係（表4）、同居寄留、雇傭等關係產生金工技術的傳承，並串連起他們在臺南金工產業的脈絡。本節根據281位臺灣（福籍）「金匠」戶員進行親屬關係分析，依據戶員間登載的「原籍」、「姓氏」、「父母欄」、「續柄」及「同居寄留」等資料，推判其親屬關係（父子、夫妻、兄弟、旁系親屬）以深入探討臺灣「金匠」的師承脈絡。

由於金銀材料屬於「貴金屬」產物，因此，傳統金匠司阜傳承授藝除了傳統拜藝學師方式之外，從顯示資料推論，最常傳承金工技

表4 臺灣人（福籍）金匠親屬系譜

管轄 派出所	父子關係	兄弟關係	旁系（姻親） 親屬關係
竹仔街	1. 龔虎（父）、龔允治（長子）、龔允陞（次子）、龔允土（三男）	1. 萬鄭發（長子）、萬興（次男）、萬泉（三男）、萬坤（四男）、萬爾松（五男）	1. 龔朝福（夫）、龔林氏銀（妾）
	2. 龔明德（父）、龔安（長子）		
	3. 詹再傳（父）、詹得材（子）		
	4. 盧皮（父）、盧祥（子）		
	5. 陳鄭氏素（母）、陳天水（子）		

表4 臺灣人（福籍）金匠親屬系譜（續）

管轄 派出所	父子關係	兄弟關係	旁系（姻親） 親屬關係
三界壇	6. 黃江記（父）、黃汝南（長子）、黃讚富（次子）	2. 俞烏毛（長男）、俞城（次男）、俞泉（三男）	2. 林虎（叔）、林旺（甥、長男）、林海（甥、次男）
	7. 呂回（父）、呂棘（子）	3. 呂悔（長男）、呂榮（次男）	3. 許地（連襟）（呂悔妻子的哥哥）、呂悔（連襟）
	8. 侯成（父）、侯金裕（長男）、侯金生（次男）	4. 郭懋炳（兄）、郭溪水（弟）	4. 李老祥（表兄）、李松（表弟）
	9. 歐陽在文（父）、歐陽朝（子）	5. 曾遠堂（兄）、曾送（弟）	
	10. 陳海桐（父）、陳灶（子）		
莊雅橋	11. 吳灶（父）、吳戊己（子）	6. 顏達（兄）、顏廣（弟）	
	12. 廖若明（父）、廖振聲（子）	7. 楊強（兄）、楊成（弟）	
		8. 王澎（兄）、王順（弟）	
		9. 方定（兄）、方送（弟）	
		10. 郭貶（兄）、郭回（弟）	
		11. 歐仕（兄）、歐全（弟）	5. 歐仕（叔）、歐金標（甥）
		12. 楊陽（長男）、楊晒（四男）、楊波（七男）	
元會境	13. 李珠（父）、李臭（子）	13. 王寶（兄）、王頭（弟）	6. 葉瑞（叔）、葉再福（甥）
	14. 陳大樞（父）、陳文枝（子）		
	15. 謝怡然（父）、謝虎（長男）、謝典（次男）		
	16. 林燦（父）、林聯登（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藝的方式屬「親屬」間的傳承。金匠司阜以兄弟共同拜師學藝或傳承給兒子、兄弟、甥姪等親密親屬的方式傳藝。本研究從281位戶員間登載的原籍、姓氏、父母欄及同居寄留等資料，進行其關係比對分析後，結果顯示281位戶員共有16對「金匠」具有父（母）子關係、13對具有兄弟關係、6對具有旁系（姻親）親屬關係。以「親屬」間傳藝、或兄弟共同習藝的人數高達81人占福籍金匠總數的29%，其中則以三界壇區域的親屬關係最密切。從研究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1. 由於金工產業包含金屬打造與販賣，從戶籍資料證實，日治初期金工產業不只是男性的技術工作，也有少數女性一起投入金工相關產業，並形成家族事業。當時女性從事金工產業的因素，有來自家族傳承、姻親關係、雇傭關係等。
2. 對於遠距外移的人口（如中國、澎湖廳）同家（宗）族從事同一工作，並形成工作聚落的比例很高。日治初期，臺灣金匠對於金工技藝的傳授方式除了傳統師徒制之外，以親屬間的技藝相授仍屬多數。

四、臺南廳臺南市十字大街傳統金匠人口脈絡

日治初期臺南市的街路名仍承襲清代留下來名稱，在大正9年（1920年）以前，臺灣並沒有市的層級，然明治38年（1905年）府令第89號中臺南廳列為臺南市（劉澤民 2008）。明治42年5月（1909年）將臺南市街區分東、西二個區長役所，將管轄區域列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為土名（黃典權 1958a）。臺南市中區於明治39年至大正3年（1906-1914年）間的戶口調查簿資料，每一戶登錄的地址名稱均以甲、乙、丙等土名記載（見圖13），並非以清領時期的舊街名（如打銀街）登錄。

「府城十字大街」最繁華熱鬧的地段，位於現今臺南市民權路二段與忠義路二段交會，當時負責這個區域的管轄派出所為竹仔街派出所。根據臺南清領時期舊街道文獻，並對照清領時期地圖、戶口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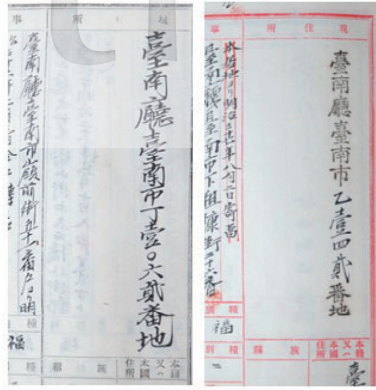


圖13 明治39年戶口調查簿現住所土名地址登錄資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簿登載資料比對顯示：竹仔街派出所負責管轄區域的土名地址主要為丁、戊、丙三區，其中以丁、戊二區為主要區域，將府城十字大街區域的舊街道地名與土名對照（表5），竹仔街派出所所管轄的區域約有47條街道，其中有23條街道位於十字大街上。

從清領到日治初期府城十字大街一直是臺南市重要的商埠中心，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金匠」總數300位，其中竹仔街區域占98人，也是中區四個區域「金匠」密度最高的地方。根據竹仔街區98位金匠的原籍分析顯示，有41位金匠原籍在現住所、43位原籍位於臺南廳臺南市、嘉義廳2人、澎湖廳5人、來自日本的移民者3人、中國移民者4人（見圖14）。

為深入探討竹仔街區域「金匠」的聚落，本研究根據98位竹仔街區域金匠的「現住所」分析，其中有85位居住在土名地址戊、8位在丁、5位在丙。日治初期有86.7%的金匠聚集在竹仔街戊區（見圖15），使其形成竹仔街區域最龐大的金匠聚落。這個區域位於現今民權路二段往西門路二段的方、及忠義路二段往民族路的方向。然而現今臺南市中區金工產業大本營則位於臺南市西門路二段，在過去都認為現今臺南市的金工聚落是由於都市更新所造成的因素，然，從研究資料推論，由

表5 府城十字大街區域舊街道地名與土名對照

竹仔街派出所管轄區域	清領時期舊街名	靠近十字大街附近的街道（現今民權路上）	靠近十字大街附近的街道（現今忠義路上）
丁	大平境街、天公埕街、打鐵街、枋橋頭前街、枋橋頭後街、草花街、做針街、陳子芳街、鞋街、蕃薯崎街、三四街（一部分）、上橫街（一部分）、五全街（一部分）、打銀街（一部分）、上打石街	草花街、鞋街、打鐵街、做針街、枋橋頭前街、枋橋頭後街	陳子芳街、下橫前街、打銀街、三四街、五全街、上橫街
戊	十三舖街、小上帝街、下大埕街、三元巷街、大井頭街、下打石街、大媽祖街、下橫前街、下橫後街、內南河街、內宮後街、內媽祖港街、內關帝港街、帆寮街、竹仔街、米街、佛祖廟街、利源巷街、赤崁樓街、抽籤巷街、武廟街、武館街、范進士街、統領巷街、帽仔街、萬福庵街、縣口尾街、小媽祖街（一部分）、做襪街（一部分）、開仙宮街、三四街（一部分）、上橫街（一部分）、五全街（一部分）、打銀街（一部分）	十三舖街、大井頭街、下橫後街、內南河街、內宮後街、竹仔街、武館街、帽仔街	范進士街、做襪街、打銀街、三四街、五全街、上橫街
丙	五帝廟街、做襪街（一部分）、開仙宮街		做襪街、五帝廟街
街道總數	47條（扣除重複街名）	14條	9條（扣除重複5條街）

資料來源：黃雯娟（2014）。

於西門路二段鄰近當時金工聚落（戊區），因此，當時「金匠」的聚落也可能是影響臺南金工產業的區域遷移的原因之一。

由於竹仔街區域的商業發展與先人生活上對金銀細品的需求，促使許多金匠落籍及寄留在這個區域。從戶籍的登記資料發現，竹仔街區域有高達84位金匠是臺南在地人，占此區域金匠人口總數85.7%。

竹仔街區域金匠原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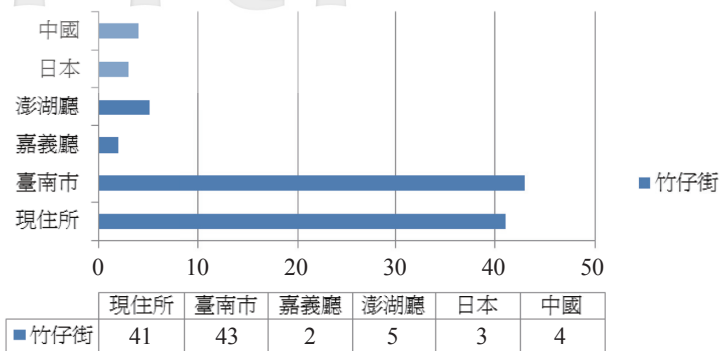


圖14 竹仔街區域金匠原籍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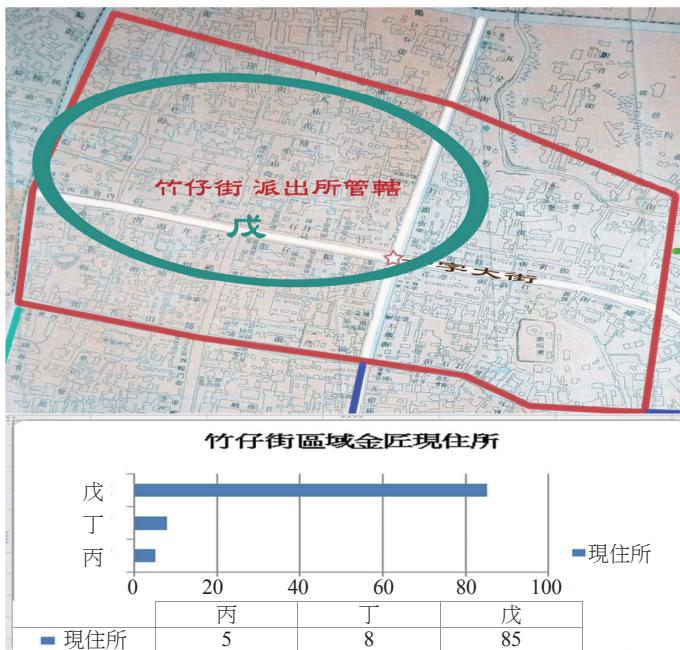


圖15 竹仔街區域金匠現住所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成果。

從上述資料再次證實，早在清領時期臺南「金匠」已經在府城十字大街附近奠定堅實的金工基礎，透過日治初期的「金匠」人口調查證實，臺南本地「金匠」是臺南金工奢侈品的重要推手，臺南「金匠」帶動了這個城市的奢華流行與富貴之氣。

府城十字大街繁華之景堪稱全臺之冠，此區域的治安穩定、商業發達，使得許多移民者也選擇在此生活，竹仔街區域除了有臺灣籍的人居住於此，另外就屬日本人移民者的比例最高。來自日本的移民者6名「金匠」有3位在竹仔街區域，占全數日本「金匠」的一半比例；而中國「金匠」有4人，占當時中國「金匠」總數近三分之一。本研究透過戶口調查簿以具科學及實證的方式證明，從清領末期至日治初期臺南的金屬工藝早已經奠定根基，三百多年前來自閩粵的移民者，在臺灣臺南最繁華的商業街區打造屬於那個世代的時尚奢華，截至目前為止，仍將珍貴的金工技藝流傳於此。

伍、結論

除了人口聚集因素之外，人口特質與其脈絡是影響區域繁榮及產業發展的關鍵性的因素。貴金屬工藝之所以能歷經百年延續，除了臺灣先人的生活習慣，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商埠繁榮、經濟發展、人民奢華富貴氣息等因素，是造就金工產業在臺南奠定百年基石的重要動力。由於「金匠」是屬於高專業性的技術產業，對於專業性質的產業要形成龐大從業人口聚落，絕非短時間一蹴可及，必當經歷數十年時間的堆累與人口群聚，因而從研究結果證實，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的金工產業之所以蓬勃發展，早在清領末期已經奠定基礎。

本文藉由戶口調查簿的資料，以具科學性及法律憑證的信度，進行臺南市中區金匠人口脈絡、從業聚落及師承系譜之研究，不止證實臺南金工技藝的在地性，並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臺南市當時繁榮商埠、經濟發展、人民習慣與移民人口對臺南市中區金工產業造成的影響。

一、「臺南傳統在地金匠」是臺南金工產業重要的人文資產

由於清領臺灣後禁止移民人口，因此在臺灣的「福」籍（臺灣人）大部分是經歷幾百年族群融合後的臺灣人。日治初期臺南市市區金工產業從業金匠以「福」籍（臺灣人）最多，占當時「金匠」總人口的93.7%，「內」籍（日本人）與「清」籍（中國人）二者總數僅占全體金匠6.3%；其中臺灣金匠又以現居臺南市的金匠的比例最高，占金匠總數的85%。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推論，由於臺灣金匠乃是從清領以前就留駐在臺灣的閩粵的移民者，其技術乃承襲先人來自中國的金工技藝。日治初期在臺南從業的日本與中國金匠總數只有19人，而且大多數為臺灣金匠的雇人，理當技術的主導性不高，日本與中國金匠的技術在當時並不足以影響整個區域，因此可推論，日治初期臺南金匠並不會受到後期移民金匠而產生技術上的影響。臺南金匠雖然承襲早年來自中國的傳統技法與創作風格，但長久以來歷經時間與文化的洗禮，臺南金匠逐漸發展出屬於在地的金飾藝術風格。除了從金匠戶口脈絡推論之外，從下列歷史文獻也可證實。

臺灣發現的36座明鄭時期墓葬中，有26座位於臺南市，從明墓出土的陪葬飾品被視為研究臺灣早期漢人金銀飾件極為重要的材料。例如：從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發現一對女性金耳環（見圖16）與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明代墓出土一對葫蘆形金耳環（見圖17）幾乎一樣（李建緯 2016）。根據考證，這類耳環因為二珠相累，故稱「二珠環兒」（揚之水 2014）。證實，臺南金工在金飾風格曾受到中國的影響。

明末清初時期的臺灣以務農為主，早期臺灣的金銀器主要來自大陸，金匠技術也是承襲自中國。臺南傳統金匠所擅長的繫絲、雕鑿（鑿花）、搵花等技法多源流自閩粵師傅，當時亦分為福州、泉州等派別（曾永玲 2012）。中國古代早已發明金屬雕鑿的加工技術，在商周時代已廣泛運用於青銅器的裝飾上（曾永玲 2012）。中國仰



圖16 臺南市許懷沖夫婦墓
女性金耳環

資料來源：李建緯（2016）。



圖17 南京中華門外鐵心橋
明代基金耳環

資料來源：李建緯（2016）。

韶文化晚期（西元前3000年）為青銅器時代開端，即有雕花技法（趙丹綺、王意婷 2008）。早年臺南金匠擅長以臺灣鄉土風味為主題，打造的純銀水牛、牧童、檳榔樹（見圖18、圖19），亦或是婚禮套鍊（見圖20）茶壺（見圖21）等作品，所使用的技巧即為纒絲、雕鑿（鑿花）、搵花等技法。根據上述文獻證明，臺南市的金銀首飾早年受到中國金飾藝術風格與金工技術影響至深。然而，群聚的臺灣金匠受到當時臺灣社會脈動與文化感染，臺南金匠以藝術、技巧、創作傳達對在地文化的情懷，發展出獨具在地特色的金工藝術。

二、日治初期臺南金仔窟的金工榮景

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已經形成多處「金匠」聚落。當時以竹仔街管轄區域的「金匠」比例最高，其次為元會境與三界壇。過往的文獻及訪談中，大多僅記載竹仔街區域（十字大街附近）的「金匠」群聚現象，本研究透過戶口調查簿證實，臺南市因當時金工產業的興盛，使金匠人口群聚因而得到「臺南金仔窟」的盛名，也證實專業人口的群聚現象有助於提升產業興盛。從金匠的現住所分布區域及當時街區商業特性推論，日治初期金工產業已經分為「直營店」與「純代工」。

（一）以「十字大街」為中心，竹仔街與三界壇形成二處金匠聚落



圖18 春郊牧牛圖

資料來源：簡榮聰（1994）。



圖19 歲寒三友

資料來源：周宗楊等（2014）。



圖20 婚禮套鍊

資料來源：周宗楊等（2014）。



圖21 劉坤輝金茶壺

資料來源：周宗楊等（2014）。

（金仔窟），這個區域位於現今臺南市民權路二段與忠義路二段一帶。從清領至日治時期「十字大街」上商店林立，主要販賣女性及高檔精品，也是百工技藝匯集之處，從上述研究結果推論，當時位於街道上的「金匠」主要以商店營業為主，而位於巷弄內的金匠則以代工為主。

（二）本研究證實元會境區也是當時「金匠」的大本營，該區域的金匠僅次於竹仔街，最特別的是元會境區域的金匠全部都是福籍臺灣金匠，主要與該區域主要的居住人口以臺灣人的比例最高

有直接關係。元會境區域位於現今民權路二段與青年路一帶，並非位於繁榮的「十字大街」上，但距離十字大街區域並不遠，就地理位置顯示，該區應該是當時重要的金工代工區域，藉以方便協助行銷為主的十字大街商家。

- (三) 日治初期，十字大街的「金匠」主要聚集在戊區域（今民權路二段往西門路的方向、及忠義路二段往民族路的方向），而現今臺南市中區的金工產業大本營則位於臺南市西門路二段，由此可知，過去的金匠集聚地可能是影響往後金工聚落遷移的原因之一。

三、日治初期金匠脈絡與師承系譜

日治初期，在臺南市中區從業的臺灣、日本與中國籍「金匠」其金匠脈絡與師承系譜分述如下：

- (一) 來自中國的「金匠」來臺前或入籍前應該已經具備金工打造的技術，13位中國籍「金匠」全部來自福建省，當時大部分擔任臺灣籍「金匠」的雇人，無論在工作或生活上與臺灣籍「金匠」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中國籍「金匠」在臺也因為同雇主與同鄉（族）的關係，形成工作場域的群聚現象。
- (二) 日治初期在臺南市中區的日本「金匠」僅有6位，來臺前應該已經具備金工打造的技術，他們主要在十字大街區域附近執業。日本「金匠」與其他種族，甚至同為日籍「金匠」間的關係很薄弱，他們以近似封閉、獨立的方式在臺南從事金工打造。
- (三) 日治初期臺南市中區以臺灣籍「金匠」人口最多，總共有281位在中區執業，是當時最龐大的金匠族群，其中255位是臺南市在地人。臺灣籍「金匠」有非常密集的群聚現象，他們以親屬關係、同居寄留、雇傭等關係，傳承金工技術給兒子、兄弟、甥姪等親密親屬，或是兄弟共同拜師學藝的方式，串連起在臺南金工產業的脈絡。從戶籍資料證實，從日治初期時，

金工產業不只是男性的技術工作，有少數女性投入金工相關產業，並形成家族事業。

- (四) 別的縣市外移到臺南市的臺灣籍「金匠」以澎湖廳的人口最多，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上和臺南在地「金匠」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金匠」間也因「職業」因素產生共同寄留關係，形成同宗(鄉)的「金匠」團體組織。

四、經濟發展對金工產業的影響

除了早期閩粵移民者將金工技術帶入臺灣，使得金工技藝得以在臺灣紮根之外，由於金匠所使用材料價格高昂，要使金工技藝得以延續百年，其區域經濟及消費者需求所造成的因素，必是支撐金工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庶民生活中喜以金銀為材料打造生活用品、富人喜以身穿絲綢並搭配奢華金飾、玉簪等金銀奢侈品藉以彰顯富貴氣息。從17世紀起，臺南一直是臺灣重要的政經中心，1720年代一百多家商號組成「三郊」在臺南市的商業發展、1865年開放海口通商、臺南洋行林立，買辦、豪紳的崛起，「打銀街」街道名即是在1875年臺南市開港後出現在臺灣府城街道全圖中。這也意味著早年因臺灣先民的生活習性使得金工技藝得以被長時間需求，到了清領時期臺南地區的經濟蓬勃發展之後，人民期望藉由奢侈金品彰顯地位或以儲金保值為目的，是支持金工技藝永續留存與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清領到日治初期，金銀工藝早已成為臺南先民生活的一部分，當時臺南市中區的繁華榮景與金匠技藝，打造了專屬臺南風華的鑲金歲月。金工商品屬高單價奢侈商品，金工產業的蓬勃發展也突顯了當時庶民的文明價值和勞動價值，同時標誌著當時庶民集體對富貴氣息的認知與追求，見證傳統「金匠」在奢侈工藝與社會經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迄今，這些傳統金匠與其技藝仍是臺南重要的工藝資產，他們不止展現臺南在地金工精神、質感與品味，也蘊涵豐富的在地百年金工歷史與文化。

airiti

謝誌

陳怡君 邱上嘉

感謝臺南市中西區戶政事務所及所內同仁於本研究期間，提供研究調查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airiti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2015）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http://www.rchss.sinica.edu.tw/popu/dataill.html>（取用日期：2015年7月20日）。
- 戈思明主編（2015）寶鈿金花：惠風閣金銀器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王振惠主編（1978）臺南市志卷首。臺南：臺南市政府。
- 李明珠主編（2006）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李建緯（2016）臺灣傳統金銀飾品初探。黃金博物館學刊，4: 20-47。
- 周宗楊、曾曉馨、張耘書、陳桂蘭、謝玲玉（2014）鑲金歲月：金工之美：臺南傳統金工藝術。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 周鍾瑄主編（2005）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林明德（2002）臺灣工藝地圖。臺中：晨星。
- 洪汝茂主編（2005）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法律及用語編譯。臺中：臺中縣政府。
- 洪慶麟（1967）臺灣戶政制度之沿革。臺灣文獻，18(2): 95-109。
- 翁佳音、鄭振滿、吳密察、黃清琦、謝仕淵、簡明捷、石文誠等（2011）古城·新都·神仙府：臺南府城歷史特展。臺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馬良誠譯（2010）Abraham Harold Maslow著，動機與人格。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 曹婷婷（2014）府城。老時光：從安平到舊城區。臺南：臺南市府文化局。
- 連橫（1921）臺灣通史（下）。臺北：黎明。
- 陳文達（1961）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陳金田譯（1993）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三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1): 87-104。
- 揚之水（2014）中國古代金銀首飾（三）。北京：故宮出版社。
- 曾永玲（2012）鑲金器成：臺灣金屬工藝文化。南投：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 曾培、葉劉天增譯（1992）Giulio Carlo Argan、Maurizio Fagiolo著，藝術史學的基礎。臺北：東大。
- 黃典權主編（1958a）臺南市志稿卷一·地理志。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 黃典權主編（1958b）臺南市志稿卷四·經濟志。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 黃偉嘉（2015）從《臺南廳公文書》再探臺南市町名改正。臺灣文獻，66(1): 161-179。
- 黃雯娟（2014）命名的規範：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 147-186。
- 楊南郡譯（1996）伊能嘉矩著，臺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
- 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08）市區改正臺南市街全圖。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1959）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趙丹綺、王意婷（2008）玩·金·術：金屬工藝入門。臺北：鍊丹場珠寶金工工作室。
- 劉澤民（2008）臺灣市街町名改正之探討——以臺灣總督府檔案相關資料為範圍。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編，臺灣地名研究成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6-166。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蔡仁堅、蔡果荃（2012）天工開物：科技的百科全書。臺北：時報。
- 鄭維中譯（2007）Tonio Adam Andrade著，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

簡榮聰（1994）臺灣銀器藝術（下）。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Amaldoss, W. and S. Jain. 2005. "Pricing of Conspicuous Goods: A Competitive Analysis of Social Effe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2(1): 30-42.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2. "Tex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22#art2> (Date visited: July 19, 2015).

A Study of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Goldsmiths in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in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I-Chun Chen* Shang-Chia Chiou**

Abstract

The booming metal craft industry in Tainan dates back to the period when Taiwan was under the Qing dynasty's rule. Back then, trading activ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mainly congregated in contemporary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ook data, as generated from the first population census in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between October 1905 and 1914. Historical methods are employed as auxiliary methods to explore the booming metal craft industry,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of goldsmiths, settlements of goldsmiths,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ldsmiths, and the ancestry of craftsmanship in Tainan's most populous commercial district "Cross Avenue" (the current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s of the then thriving commercial ports, the economy, people's habits, and migrants in the metal craft industry. As revealed b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 Ph.D.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Master & Doctoral Program,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babystylist_755@hotmail.com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Master & Doctoral Program,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chiousec@yuntech.edu.tw

period, local Taiwanese goldsmiths were the major goldsmith group in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accounting for 93.7% of the entire goldsmith population. In particular, the largest percentage (85%) of goldsmiths resided in the modern-day Tainan City, as for the goldsmith in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re was only 6.3%. In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several settlements of goldsmiths were formed in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In particular, Bamboo Street, which was neighboring "Cross Avenue," was the highly concentrated zone for goldsmiths, followed by the region with a plethora of temple establishments. Most goldsmiths in Taiwan were either people from lineal or collateral relatives, landlord and tenant, or owner and apprentic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oexisting" 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goldsmiths emerged owing to this occupation. Apparently, inheritance of the goldsmith skill was based on the bond between master and apprentice, relatives or clans. Other than Taiwanese predecessors' habits in everyday life, why the expensive metal craft industry has continued for over a century can be attributed to flourishing commercial ports, th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extravagant and affluent atmosphere among residents, all of which were important sources of momentum for the metal craft industry's century-long foundations in Tainan.

Keywords: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ook, Tainan City's central region, traditional metalsmith